

第一章

导引问题

本书以及这些导引问题是试图突破“发展理论”的恶性循环。最最当代的（即新古典派）发展理论家都作茧自缚地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他们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穷，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富（缪达尔，1957）。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低水平平衡陷阱”（莱本斯坦）是通过凯恩斯式的需求或市场交换方面而显露的：由于穷人无力支付，富人投资就不能得利，因此穷人就始终受穷。其他经济学家和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人文地理学）则从供应或生产方面陷入恶性循环：他们的理论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缺乏资本、企业家才干以及其他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政治素质，这些理论家认为这都是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而为投资与发展所必需。大多数当代的理论家作茧自缚地陷入了狭窄的理论恶性循环，这有效地界定了他们自身创造的理论局限而不符合发展与不发达问题的现实，因此他们无法解释国贫与国富的性质和原因，有关的决策者们就更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了。为了突破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建议重新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其作为出发点，并设法根据后来的历史发展与理论发展使之发扬光大。

为了摆脱狭窄而局限的新古典派理论无法对国富与国贫的性质与原因进行认真的研究，我们可以将亚当·斯密的全球历史观和卡尔·马克思的辩证历史分析法作为出发点，设法推进一种

包罗全世界的全盘性的、反映真实世界历史的、具有社会结构性的（所以实际在理论上就是辩证的）发展与不发达理论。这项任务要求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据和记录进行科学的调研，并根据这种证据来更好地在阿尔都塞的意义上重温亚当·斯密和马克思——而这一切却是新古典派‘发展理论’故意回避的。我们秉着这个目的和这种精神，综观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参与这种世界范围历史进程的情况；我们强调，这些地区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从属性依附地位就是它们不发达的发展的原因所在。现在的理论论文试图从“依附论”观点再前进一步，并建议研究资本积累进程为国富与国贫的决定性本质与原因。所以，本书及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温’，也是对既有历史记录与证据的重新审察。

一、“内部”决定对“外部”决定的问题

我们可以研讨这个问题：发展与不发达对发生着变化的社会单位而言是由内部还是由外部决定的？其决定领域是生产领域还是交换领域，抑或二者兼有？

马克思说：“现代生产方式只有在它的条件已经在内部形成的地方才发展起来。”毛泽东说：“适当的温度只能使鸡蛋变化为鸡子，但不能使石头变化为鸡子。”然而，一切古典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包括亚当·斯密、马克思和毛泽东都认为，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宗主国及其亚、非、拉殖民地之间的交换关系和统治关系，对这些地区的历史发展或者说历史不发达产生决定性影响。但是，试图说明或解释（了解，更不用说干预）世界历史进程的后者，却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理论问题。我们的理论分析怎么能既承认殖民地“内

部’生产进程的首要性,又使它与兼具决定性的‘外部’交换关系及其他对资本主义宗主国的依附关系调和或结合起来呢?亚当·斯密对此帮助有限(虽然我们下面将引述他对殖民地的分析),因为他倾向于着重交换而排除生产,甚至有一处提出殖民地的不幸“似乎是偶然造成的”。马克思之专注于宗主国的生产进程,使他把我们的问题归入他永远不打算撰写的一卷《资本论》之中,而与此同时他认为国际贸易的这些后果“真正超越了我们的(他的)分析范围”;他在结束《资本论》第一卷中短短的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理论’时承认:“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研究殖民地的状况。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 843 页)

其他人提出并回答了内部决定对外部决定的问题。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道: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帕洛伊在特别谈我们的问题时用同样的语调写道：“就我来说,我认为应当从主宰经济的(内部)情势开始,以便在连锁的另一端看到它通过不平等交换对他人发展的影响。不平等交换是一种中继,一种联系,其本身不是目的。”(帕洛伊,书目 1969 a,第 221 页)

但是帕洛伊在别处谈到不发达国家时继续说：“外部动力决不能导致内部动力,相反却追随内部动力;它不是自主的,而是被内部动力所诱导的。除此以外,所谓外部动力只是内部动力所提问题的外部表现而已。”(帕洛伊,书目 1969 b,第 21 页)

贝特尔海姆同样认为:

富国对穷国的“剥削”……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被统治国“渗透”的重要事实,以及资本运动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心引起的结构变化。……所以,有必要把每个“国家”视为构成某种以特殊结构为特点的,以及以存在利益相互冲突的各个阶级为显著特点的社会形态。正是这种结构决定了各种社会形态介入国际生产关系的方式。这里我们又发现了这个基本主张:剥削关系不能在‘交换水平’上构成,它们必须植根于生产的水平上,没有生产,交换无法更新。(贝特尔海姆,见埃马纽埃尔书目,1969,第 325 页)

这些考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就理想而言,我们应当设法对全世界整个资本主义积累进程以及对随之而来的全世界生产方式的变化进行历史的理论分析。但是这项任务所必需的

分析和理论发展却超越了本文和本书的范畴。这对于该范畴内可以适当产生不发达理论，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但是，适合于分析全世界资本主义积累和发展（及不发达）的理论，其发展速度仍然超乎我们的想象：自列宁以及近半个世纪后的巴伦与斯威济以来，对这一全球性理论提出重大突破的著作为数寥寥，为时颇晚——而且主要面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不发达部分：帕洛伊所著《开放经济中的增长问题》（1969），伊曼纽尔所著《不平等交换》（1969），以及阿明最为雄心勃勃的著作《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积累的理论》（在本书写作时尚未出版）诸研究作品。所以，我们首先对不发达国家不发达问题及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的研究，其实际局限并非任意提出，而是必然存在的。 5

这种局限反过来又给我们提出了它自身的理论与阐述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首先观察资本主义宗主国的生产方式与资本积累。我们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简单地来一个互换，从宗主国内部换到殖民地内部呢？不能，这样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只会在科学上和政治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批评意见见弗兰克书目，1969 瓦伊塔尔书目，1968。）我们能不能把殖民地简单地看成是一些受到宗主国外部力量无辜侵害（或拯救）的国家呢？不能，这些自命的“结构主义者”，例如这样做的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分子们，只是提出一些依附征象的表面现象，而转移了我们对“外部依附性”的基本内部性质或原因的注意。（批评意见见拉米雷斯书目，1966 多斯·桑托斯书目，1969 弗兰克书目，1969。）那么我们如何既能分析殖民地的“内部”生产方式和积累或不积累，又仍然充分考虑到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外部”交换关系和资本流动的殖民依附呢？

为了在我们的分析中遵循这种辩证程序（正如帕洛伊和贝特尔海姆被迫所做的），我们就必然要回头研讨整个世界资本主

义体系的内部矛盾以及其中的宗主国。而且，为了让这些标准使用恰当，我们的分析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是同步、动态而辩证的：它必须分析世界体系各个部分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同时相互作用，并观察它们的矛盾在随后的各个时期如何产生它们的性质和相互作用。这仍然超越我们此时的能力，但以后在弗兰克的《世界积累，1492—1789》以及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中作了尝试。

另一方面，我们在本书中专门注意了（虽然仍然很不充分）世界资本主义的和宗主国的资本积累与发展的内部动力；我们还尝试着进行同步分析：试图指明世界资本主义积累与发展直到晚近的三大历史阶段；我们又考察每一阶段的全世界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如何导致下一阶段的发展。对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发达部分，我们特别设法强调形成其生产方式特点的主要内部矛盾。尽管我们有这些良好的意愿，我们在这方面的局限可能不仅仅是数量上的，而且是质量上的。

在评论本文的早先一稿时，我们的朋友乔瓦尼·阿里吉正确地說道：“现在我来谈更加基本的问题。在整篇导论中，如同你们以前的作品，对内部结构的分析总是从属于对外部条件的分析。那就是说，你们采取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说的‘形而上学观’。对事物发展的解释，首先不是从它们的内部结构与矛盾中去寻找，要分析它们（一旦认清以后）与外部条件的辩证相互作用。你们却是寻找现象与内部结构和矛盾的外部决定因素。……换句话说，我认为你们没有信守自己的保证：辩证地分析不平等交换与社会生产条件所强加于生产要素的种种局限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倾向的主要方面是使阶级分析从属于殖民地结构的分析。两者能够而且必须结合起来。……毛泽东的观点与你们的观点之间的差别在于：在前者，殖民地结构是阶级分

析中‘固有的’而在你们的作品中,则是阶级结构分析(在进行时)是殖民地结构分析中‘固有的’。虽然结论往往是类似的,这两种观点却在两大方面有所差异:(a)……你们的观点往往反对把历史力量与矛盾等同起来,而它们都能产生革命结构变化。……(b)更为基本的是,你们的观点喜好概括(而概括与抽象相反,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因此不鼓励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真髓(虽然事实上你们的结论却来自具体分析)在政治上,概括当然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采取一些往往与有待变革的内在矛盾无关的行动。……”(阿里吉,个人通信,1970年3月23日。这同一论点的长篇内容后来发表在两篇文章中,1970,1972)

这里,我们当然要避免阿里吉提到的错误。但是我们的数量局限有时排除了把“外部”因素的分析作为世界资本主义或宗主国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而我们的质量局限又使我们令殖民地的内部矛盾脱离其正确位置以分析依附性外部原因,毛泽东对此并不排除,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更不用说新古典派理论家了——则在调研不发达问题时对此忽视。我们设法不要概括特定的具体经验,而要把支撑和支配这种具体现实的一般原则加以抽象,使这些原则在各个时间与地点更有效地用于改变具体现实。

二、分期的问题

这一问题的其他学者也面临分期问题,目的与我们类似,但并不一样。在这些学者中,我们可以提到普里奥巴曾斯基、曼德尔和阿明。普里奥巴曾斯基在20年代讨论原始积累时写道:

对于以经济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剥削史，我们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个是青年资本主义时期，理论上是自由竞争但事实上是垄断。……这个时期以后，接着是自由竞争时期。……最后是第三个时期，即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由于建立了一种全国——资本主义机制的体系，……我们在一方面看到每个大资本主义殖民强国倾向于把它的内部市场垄断化扩充到殖民地去并以武力来保卫这种权利。另一方面，由于资本输出到殖民地，来自殖民地的剩余利润越来越成为来自同样技术水平而工资较低的企业剩余利润的形式。这种从一种剥削逐渐转移到另一种……（普里奥巴曾斯基，94—5）

曼德尔划分了类似的时期，强调了每个时期中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典型交换关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剩余价值的起源与占用因此构成了三个不同时段的辩证统一：以不等价为基础的不平等交换，以等价为基础的平等交换，以等价为基础的平等交换。只有考虑了这三个历史时段，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资本在西方世界里是怎样起源的？它是怎么增长的？它是怎么扩张到世界大部分地方去的？因此，这种初步回顾已经使我们面临两大时段——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不平等交换；当代世界商业中心的不平等交换——以及西方资本与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曼德尔《原始积累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英语版译自法语原文，西班牙语译文载哈瓦那《思想评论》第36期。由于打字错误，法语原文的三个时段缺了两个，但在西班牙语版中补上了。）

曼德尔的各个阶段在历史时间上大体相当于普里奥巴曾斯基的古典阶段，但我们将在下面注意到，宗主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的三类交换关系并不是所有殖民地在确切的同样时间里总是经历到的。

萨米尔·阿明对于结构性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兴趣与我们相类似，但是他对《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一书的撰写范围则大大超过我们，而划分的阶段则类似。他更加关注殖民地在三个阶段的世界（即宗主国）资本积累进程中的不同地位或功能；他也同样谈到特定殖民地或殖民地集团后来经历的特定的结构性不发达进程和类型。阿明总结称（他在一封个人来信中评论本文的早先一稿。——他不想把评论公开发表）：

我划分三个时期（1）重商主义，（2）发达资本主义（后工业革命，前垄断），以及（3）帝国主义。在每一时期中，外围地区都有相应的特殊功能，为中心地区的重要积累需求服务。在第一阶段，外围地区（主要是美洲，次要是非洲，它为前者提供奴隶）的重要功能是容许大西洋商业资产阶级积累货币财富，这种财富在工业革命后转变为实际的资本。因此就有了种植园制（在掠夺矿藏以后），整个美洲就依靠它从十六世纪转入十八世纪。这种功能因工业革命而失去其重要性，当时，资本的重心从商业转到了工业。因此，外围地区的新功能就是要降低（a）劳动力价值（通过供应大众消费的农产品），以及（b）经常资本组成要素的价值（通过供应原料）。换句话说，外围地区容许反对利润率下降的趋势（马克思也观察到这一点——弗兰克注）。为了达成这一点，在第2时期中，资本只能支配一种手段：商业。另一方面，在

第三时期中,资本还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资本输出。因此,只有从那时以来,而不是在那时以前,真正的不平等交换才出现了。

我们可以认为,这里说的‘真正’指的是曼德尔所谓的‘以等价为基础的不平等交换’,普里奥巴曾斯基谈到的“具有同样技术水平而工资较低的企业的剩余利润”,伊曼纽尔在《不平等交换》标题下分析的主要交换方式,而这也是我们讨论十九世纪时还将再加研讨的分析和分期问题。阿明将不会否认曼德尔所说的“以不等价为基础的不平等交换”在重商主义时期的最先优势地位,在这个时期中,这种不太细致的剥削方式在世界资本积累、宗主国发展和大多数殖民地的不发达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正如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已注意到的。这里的第一时期,特别是这段时期中的内部结构性变化,在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分析不发达的发展时也进行了研讨。

三、生产与交换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按照我们的理论核心问题,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这些纲要各自强调了一个不同的方面(虽然上面引述的简短段落中的这种强调不一定勾划了这三位作者主要著作的特点):在第一个纲要中,各阶段的划分主要根据宗主国生产结构的差异。在第二个纲要中,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种种交换关系的有关差异中含蓄地提到上述这种差异。阿明更加明白地讨论宗主国积累与生产进程中这类交换的功能,强调后者决定前者。鉴于本文的前述范围与局限,我们将首要关注这一进程中殖民地内部的结构变化,并设法研讨殖民

地在世界资本主义积累进程各阶段中的功能怎样通过殖民地的生产方式而关联到生产进程（和非积累进程，这是很重要的）及其组织的。简言之，我们将提出：在第一阶段，殖民地的资本被严重剥夺，它们发展的结构性能力被严重削弱，虽然尚未消灭。在第二阶段（这在各个殖民地并不是确切同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弱小社会力量对宗主国工业资产阶级及其在殖民地的盟友进行了不成功的生存斗争（除了在新的移民殖民地）。在第三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阶段，这些殖民地中发展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被全部消灭或者完全不许构建，因此排除了在资本主义下的进一步发展或未来发展，巩固了各殖民地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发达的发展，并产生了当今新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矛盾与斗争。在整个分析中，由于我们的局限，我们将面临上述的‘外部’交换对‘内部’生产或阶级决定性的问题。

我们研讨资本主义积累与发展阶段的历史经验的主要目的，是要把最紧密和重要地参与这一进程的那些殖民地当时的生产方式中的要素抽象出来。但是，第一个重商主义资本主义阶段则直接、间接地通过它们的相互关系成为在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基础。所以，我们对第一阶段的调研也必须包括对直到后来才产生它们最重要成果的那些进程的历史根源加以分析。

在我们对第一阶段的调研中，出现了下列三个问题：（1）为什么大多数欧洲殖民地遭受不发达而其他一些殖民地却获得发展？具体来说，为什么新世界的大部分处于不发达而只有美国和加拿大逃脱了这种命运？（2）集中于单一生产供出口的原材料，对于这种进程起怎样的决定作用？（3）走向不发达的国家与（真正）走向发展的国家之间的工资水平差异的历史根源和解释

是什么？

这三个问题及其答案是相互密切有关的，是和世界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达密切有关的。其中有些内容虽不详谈，但将在本书稍后部分(第五章)进行研讨，这里可以暂时谈点看法。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化已经在西欧（除去地中海地区）及其海外白人移民拓殖地（具体而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繁荣昌盛。南非、罗得西亚和巴勒斯坦也有局部发展，那里是由白种欧洲移民和土著人口占有的。其余的殖民地（以及半殖民地、新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占人类绝大多数人口，却沦于不发达。这些后者殖民地集中于并专长于生产未加工或粗加工的原料，供出口到宗主国；虽然有些移民拓殖地在它们历史上的某些时候也曾集中于原料出口。伊曼纽尔，以及阿明和马丁内斯（他们二人在更晚近的未发表研究中）否认原料生产专业化本身决定了不发达（虽然他们的理由不同于新古典派经济学家或加拿大的‘主产品’增长理论派），并声称明显的决定关系只是一种‘视觉幻象’（伊曼纽尔，49—50），说对它的强调是一种‘神秘化’（阿明）。

相反，不平等交换的主要分析家们（伊曼纽尔以及帕洛伊和阿明），认为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等价）不平等交换，至少自十九世纪以来，是由双方的不平等工资水平所决定的。如同马克思和普里奥巴曾斯基，他们认为高工资与低工资国家间的贸易导致等价的不平等交换（或者说，市场价格对高工资产品定值过高，对低工资产品定值过低），因而促成前者的资本积累和发展，而以后者的丧失资本和不发达为牺牲。伊曼纽尔也看到不发达国家都是低工资水平，而高工资水平与发展都恰恰在西欧及其上述海外移民地，因此他接着认为：“由此看来，发展不是高工资的原因，而是高工资的结果。”（伊曼纽尔，161）我们暂且不

谈这种论点的优点（以下第五章将作进一步研讨），这里只来看看伊曼纽尔自己对自己分析的看法：工资水平这样就成了伊曼纽尔整个分析中的独立变项，而不去努力解释原来工资水平的根源以及交易国之间工资差异的根源，除了几点非主要的（大部分是错误的）看法我们将在后面讨论。但是这意味着，对贝特爾海姆和阿明，我们必须询问上面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宗主国及其海外移民地与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之间工资水平的原先差异，是怎么开始的？其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将在下面一章里讨论。

第二章

世界资本积累、贸易格局 与生产方式,1500—1770

我们可以简要总结大体从 1500 年到 1770 年之间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并观察随之产生的殖民地地区生产方式的转变,从而回顾世界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达的第一个主要时期或阶段。第四章里将把欧洲宗主国内有关的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作为此历史进程第二阶段的一部分加以研讨。

在长达三个世纪的这一世界资本积累的重商主义阶段中,起主导影响的是欧洲商贸活动无可逆转的显著增加以及供出口的殖民地生产增长——这种生产又是受欧洲宗主国商业所刺激、控制和剥削的。刻画这样的特点,并不是要否认这个时期中欧洲生产的重要性及其转变(我们也注意到它的重要性),而是要把这种欧洲商业对殖民地生产关系及其不等价基础上的不平等交换(见前引曼德尔语)同欧洲在第二及第三时期中的生产主宰及随之发生的殖民地生产适应性转变和等价基础上的不平等交换的基本特点进行对比。W. S. 沃伊廷斯基与 E. S. 沃伊廷斯基在他们的权威性著作《世界商业与政府》一书中说(第 9 页):“新的时代要求对外贸政策进行大力的修改。着重点从寻找外国产品——这是十六世纪以前的外贸主要动力(我们将补述后来的部分情况)——转到了寻找国内商品的出路。……这对于以航海业为主的欧洲国家的殖民政策带来了显著的变化。”

或许应当特别指出(因为在我们的分析中,这一因素没有得

到应有的注意），正如马克思所注意到的，武力是一切重要变革的催生剂，然而，由壮大中的民族国家所支持的动武或许在资本积累的这一阶段尤其重要，因为欧洲宗主国在这个阶段里相对而言尚无其他手段来从殖民地榨取生产或勒索贡赋。《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者说(第4卷,第 XIX 页)：“十六世纪欧洲人的技术优势，加上他们的冒险眼光，可以充分说明为什么他们立即夺得了主宰地位。但是殖民地经济长期屈从于欧洲市场，不仅是由于经济条件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于白种人在冲击关头和巩固时期都使用了军事力量的缘故。”可以注意到，正是在欧洲人长期缺乏军事控制的地方(即亚洲),与美洲和非洲相比,那里的宗主国统治和殖民地生产方式的转变长时期地延后了。

一、贸易三角

世界的分工以及贸易的格局或流向可以分为两大三角：亚洲或东方三角，以及大西洋三角，它们在长时期中相互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它们正是通过欧洲宗主国而密切联系的。东方贸易三角及其东西方主轴是在美洲发现以前许多世纪里就已发展起来的（并大力依仗近东穆斯林的干预，他们的重要性在当前的分析中被大大忽略了）。这种“香料”贸易基本上包括东方的香料与制成品（主要是纺织品）出口到欧洲，由欧洲支付金银。随着非洲和新世界的部分地区在十六世纪结合进日益扩张的商业资本主义体系，部分的东方出口品被欧洲再出口到非洲和美洲（虽然有些产品通过‘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因此越来越多的东方商品由欧洲用美洲白银支付。如前面所说明的，在后文中将再次强调，这种贸易的结果对亚洲生产方式的改变在很长时期中影响较小。

大西洋三角很快发展壮大，比东方三角占用多得多的船只并运送多得多的商品(包括人员商品)，埃里克·威廉斯对此作了总结(虽然他大体上省略了西属殖民地的地点)：

在这一三角贸易中，英国——以及法国和殖民地美洲——提供出口品和船只，非洲提供人员商品，种植园提供殖民地原料。奴隶船从派出国带上制成品，到非洲海岸用以换取黑奴并获利，到种植园贩卖黑奴再获利，换取殖民地产品带回派出国。随着贸易量的增加，这种三角贸易得到派出国与西印度群岛（或其他殖民地地区）之间直接贸易的补充（但决非替代），以派出国（及东方）制成品直接交换殖民地产品。从而三角贸易对英国工业起了三重刺激作用。以英国（与东方）制成品购买黑奴，运送到种植园，黑奴生产蔗糖、棉花、靛青、糖浆，以及其他热带产品，加工这些产品使英国建立了新的工业。而且，黑奴及蓄奴主在种植园的生活供养为英国工业、新英格兰农业与纽芬兰渔业提供了又一个市场。到了1750年，几乎没有一个英国的贸易城镇或制造业城镇不以某种方式同三角贸易或直接殖民地贸易有关联。获得的利润提供了英国资本积累的主流，而这种资本积累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威廉斯，51—2）

除了这个大三角，还应补充曼尼克斯在前面提到的小三角，这包括非洲黑奴、加勒比蔗糖和新英格兰朗姆酒；北大西洋三角以纽芬兰渔业（布雷勃纳）为中心；当然西属美洲以及后来葡属美洲的金、银贸易供应了东方贸易，并越来越多地进口英国和东方制成品，由英国销售到西属和葡属殖民地（及其母国）。

维系这种国际分工及其有关的连锁贸易三角的，是欧洲商

业(占主宰地位的时间次序大体是 意大利,伊比利亚,荷兰,英国),它从这种殖民地生产(一度也有宗主国生产)中,在各个三角的每一边都取得大份额的利润。在这方面,也许值得特别提一下两种有关的机制,因为它们没有像经常提到的垄断商贸公司那样受到注意,那就是:再出口,以及多边收支结算。两者都由索尔作了概述,都联系到英国:

从贸易新地区进口的货物的再出口,在十七世纪中叶是微不足道的,50年后却占到总出口的百分之三十。……再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纺织品、烟草与食糖。……贸易的多边融资已经颇为重要。总的来说,英国利用它对西欧的一大部分盈余来支付别处的赤字。这种间接结算的数额,一部分是由于再出口贸易,但即使不算再出口,其基本状况仍然是同样的格局。……葡萄牙贸易的重要性不应低估(十八世纪中叶,巴西成为黄金的一大供应国)。它有助于伦敦成为全世界的金、银市场,这些金、银供应也是英国扩大对东方贸易以及从北方购买军火的重要环节。……西印度群岛及其南边的美洲殖民地到十八世纪中叶或许已成为英国贸易联系的最重要部分。仅仅西印度群岛,就供应英国四分之一的进口,它与美洲殖民地吸收英国五分之一的出口。……可是,这两组殖民地的贸易格局是完全不同的。西印度群岛几乎始终对英国有顺差,而且,事实上它又把从英国进口的大多数货品再出口到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去。贸易收支以两种主要方式间接结算 通过“奴隶贸易”,英国送消费品去西非,然后把黑奴运去大西洋彼岸 其次是通过北美殖民地的进口盈余,它供应西印度群岛以食品、活畜、木材、等等。……第二个(美洲殖民地的)结算渠道是出口鱼